

• 女性与法律研究 •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司法实践及法官考量

李春斌

(西藏民族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国内外司法实践中均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 应考量受虐妇女杀夫的社会成因和现实处境、受虐妇女杀夫的心理状态、被害人的过错、受虐妇女是否有自首情节、受虐妇女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典型既有判决对案件的借鉴价值及社会性别视角等因素。

〔关键词〕 受虐妇女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 社会性别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2)05-0038-05

The Judicial Practice and Judges Considerations of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Theory

LI Chun-bin

(Tibet Nationalities College, Xianyang 712082, China;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t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of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theory of judicial practice at home and abroad. Our judge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should consider the social causes and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of battered women Butcher's Wif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battered women Butcher's Wife, the victim's fault, battered women have voluntarily surrendered themselves, battered women's subjective malignant and social dangers, the judgment of the case reference value and the gender perspective and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battered women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theory; gender

一、“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

“受虐妇女综合症”^[1] 本来是社会心理学的概念, 最早由美国临床法医心理学家雷诺尔·沃尔克女士在她 1979 出版的《受虐妇女》一书中采用, 并在其 1984 年的《受虐妇女综合症》一书中对该概念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描述性词语被用来指长期

遭受家庭成员特别是受到丈夫或者男性伴侣暴力侵害的妇女表现出的反应和认知的方式。雷诺尔女士对 400 多名受虐妇女进行跟踪治疗和研究后发现, 生活在暴力中的女性, 通常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她认为, 这些心理特征不是产生于可以揭示具有受害人倾向的个性的那些具体特征,

收稿日期: 2012-07-03

作者简介: 李春斌, 男, 西藏民族学院法学院讲师,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台湾“国立”中正大学交流博士生(2011 年)。

而是受虐妇女对施暴者暴力行为的认知所发展形成的特征。她假设了两个理论用以说明受虐妇女综合症在行为和心理特征上的发展“习得无助论”和“暴力循环论”。

“习得无助论”，又被称之为“后天无助感”。沃尔克女士的“习得无助论”源自心理学者塞利格曼对实验室动物的试验。塞利格曼将几只狗放在一个笼子里，每天不定时地电击铁笼子的不同部位。开始，狗在笼子里不断跳跃，试图躲避电击，但它们很快便发现无处可躲。于是，它们便停止积极的躲避行为，采取尽量减少痛苦的方式，如受到电击时，就脸朝下趴在铁笼子里一动不动，以尽量减少痛苦。沃尔克女士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受虐妇女，她提出，妇女试图控制她们的施暴者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习得无助，同时也削弱了妇女做出反应的动力。妇女在经历了认为自己不能控制的长期暴力之后，变得被动，觉得不能对即将发生于自己身上的事情施加任何影响。“一旦妇女处于习得无助状态下，她们的认知遂成为现实，她们变得被动、服从和‘无助’”。该理论解释了受虐妇女为什么不努力使自己摆脱暴力关系的原因。

关于“暴力循环论”，我们可以通过一篇小短文来直观地认知其规律。

今天我收到花了

今天我收到了花。但这既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什么特殊日子。我们昨晚吵了第一次架。他说了很多脏话，让我感觉很受伤。我知道他心里很抱歉，昨晚不是有意说那些的，因为他今天送我花了。

我今天收到了花。这不是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昨晚他把我甩到墙上，掐着我的脖子。那就像是一个噩梦，我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今天早晨醒来我感觉很痛，浑身上下都有淤青。我知道他肯定很内疚，因为他今天送我花了。

昨晚，他又狠狠地打了我，比以前都要

狠。如果我们离开他，我能干什么呢？我怎么照顾我的孩子？钱又从哪里来呢？我很怕他，也很怕离开。但我知道他肯定很内疚，因为他今天送我花了。

今天我收到花了。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是我举行葬礼的日子。昨晚，他终于把我杀了。他把我殴打致死。

要是我之前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离开他，今天我就不会收到花了^[2]。

从上面的小短文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和发展有周期性规律。一般会经过几个暴力周期，而每个周期通常包括关系紧张的积聚期（口角、轻微推搡等）、暴力爆发期（暴力发生、受害人受伤）、平静期（亦称蜜月期，加害人通过口头或行为表示道歉求饶获得原谅，双方和好直到下个暴力周期的到来）。加害人往往屡悔屡犯、始终不改。道歉、内疚、忏悔只是当家庭暴力暂时失效时，加害人借以达到继续控制受害人的手段而已。暴力周期的不断重复，使受害人感到无助和无望，因而受制于加害人。

二、“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司法实践

（一）“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国外司法实践

在美国，“受虐妇女综合症”成为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后，不少杀夫的受虐妇女因此得以无罪释放、减轻或从轻处罚。1990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州长赦免了20位因受虐而杀夫入狱的妇女，其中包括一名死刑犯。1991年马里兰州长赦免了8位这类犯罪的在押犯。此后，其他州纷纷效仿，到1992年，美国共有20多个州掀起了赦免此类犯罪妇女的浪潮^[3]。

而在加拿大的司法实践中，“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可采证据，最早是在1987年。加拿大最高法院采纳“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的出发点是：法律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缺乏性别视角，对于身高、体力、徒手格斗的能力都不如男性的女性，是不公平的。而缺乏性别意识，势必影响法官和陪审团对受虐杀夫行为的合理性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言，对审理此类案件的陪审

团来说,该证据是必不可少的^[4]。在澳大利亚,该证据可以用于阐述构成指控犯罪所必须的意志自由和犯罪故意的要件不能成立,或用于支持全部或者部分的抗辩意见,并且/或者被用来请求从宽处罚^[5]。

(二)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国内司法实践^①

在我国,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刘巍律师成功引入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并进行了减刑辩护案^{[6] (P272-280)},该案的辩护理由是:(1)被告人杀夫有着特殊的心理状态: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是事实,但应该考虑被告人长期遭受被害人暴力所造成的特殊心理状态。其不离开的原因是长期的暴力环境已经塑造了她的恐惧心理,使她打消了离开被害人的想法。(2)被告人多次寻求法律保护,但均未果。如果选择离婚,被告人会失去家人,因为被害人威胁要杀害被告人全家。(3)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其公然在家中嫖宿,并经常不间断地对被告人实施家庭暴力。(4)被告人同村邻居及被告人公婆对被告人赞赏有加,联名为其作证,请求从宽处罚,民愤不大。(5)被告人主观恶性轻,社会危害程度较小,应当从轻处罚^{[6] (P278-279)}。

“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言在2003年河北的“刘栓霞案”中进行了尝试,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一审法院没有采纳专家意见,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栓霞有期徒刑12年。在县法院审理刘某故意杀人案过程中,河北省妇联邀请陈敏律师以家庭暴力问题专家身份,对被告人刘某做“受虐妇女综合症”鉴定,并出具证词。陈敏律师认为,刘栓霞因长期遭受暴力侵害,其行为完全符合“受虐妇女综合症”的行为模式。她的人身危害性只是针对施暴人,一旦施暴人消失,对他人不会有任何人身危险性,因此可以考虑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7]。受理该案的法官认为:司法者必须是保守的,只能遵守法律,不能去做没有法律依据的事情。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受虐妇女综合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并没有被正式引入法律。刘某杀夫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正当防卫。立法层面的事不应该指望

由司法来解决,毕竟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8]。

三、“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的法官考量

综合上述“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国内外司法实践,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应考量如下因素。

(一) 受虐妇女杀夫的社会成因和现实处境

司法正义要求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10年4月20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1000余人刑事审判业务集中培训——全国高、中级法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培训班在北京开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开班式上强调,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本目的是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要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严惩严重刑事犯罪,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遏制重大恶性犯罪的发生,促进犯罪人积极改造,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9]。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在考量受虐妇女杀夫现象时,一方面要看到受虐妇女造成特定关系人死亡的后果的明显事实;另一方面也要考量造成这个结果的成因,即特定关系人死亡是如何发生的——明显的事实是——特定关系人对受虐妇女进行了长期非人的威胁、摧残、折磨、毒害、迫害。

(二) 受虐妇女杀夫的心理状态

长期受虐妇女致特定关系人死亡的心理状态,显然不同于未受虐妇女致特定关系人死亡的心理状态。对于这个明显的事实,法官不能回避,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量,因为这是我国刑法的要求。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的心理状态还是过失的心理状态,是必须具备的要件之一。在对受虐妇女杀夫案件的考量中,必须具体分析案件客观事实,是受虐妇女错手杀死了丈夫还是其蓄意杀死丈夫。如果是过失的心理状态,则必须予以重点考量。

(三) 被害人的过错

因被害人故意或过失的错误行为而诱发犯罪人的犯罪意识产生,进而引起犯罪人实施加害行为、造

成犯罪侵害结果的发生,被害人的这种错误行为即被害人过错^[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纪要》中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上述解释性司法文件中可以看出,被害人过错在我国刑法中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故而法官应当结合案件具体实施认真进行考量。

(四) 受虐妇女是否有自首情节

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了自首制度,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在实践中存在关于自首认定的以下情况:(1)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2) 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3) 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4) 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5) 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6)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7) 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8) 犯罪分子向所在单位等办案机关以外的单位、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②。只要受虐妇女满足上述8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就可认定为自首情节。自首情节是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的情节。

(五) 受虐妇女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

司法正义要争取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要求适用法律的正当性、统一性和程序性,但“单纯以法律效果作为衡量裁判的标准,在实现法律形式理性和法律规则自治的同时,实则使法律演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沦落为一个掏空了灵魂的躯壳,从而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规则中心主义的泥潭”。而社会效果则要求裁判“应当承载社会的道义性诉求”,积极回应“社会利益和立法目的的要求”,并应当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相吻合,展现“法官对法律的价值追求和意义追问”,彰显“隐于法律规则之后的力量”^[11]。因此法官应当将法律与社会公共政策、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司法正义观念相结合,追求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受虐妇女作为施暴人长期残害的对象,在杀害特定关系人之前,其一直充当着受害人也是事实上的被害人的角色。对其自身而言,其主观恶性极小。其杀害特定关系人的基本目的和最终目的一般而言均是要结束施暴人对其及其家人的进一步迫害,一旦杀害特定关系人的行为结束,其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从这个角度而言,其主观恶性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法官在判决这类案件时,应当本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原则,既尊重法律的正当性、统一性和程序性,又考量社会公共政策、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司法正义观念,作出使得群众满意的判决。

(六) 典型既有判决对案件的借鉴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全国高、中级法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培训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要强化能动司法意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延伸、扩大服务领域^[10]。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教授撰文指出: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是司法机关探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主要动因。同样情况同样处理,是一种直观的公正;同样情况不同处理,就是一种显见的也是直观的不公正。民众看司法是否公正,一般总是用朴素的思维、直观的比较来判断^[12]。如果已有的判决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且确实在现实生活中促进了司法正义的实现,群众也认为判决公正,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判决往往就达

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如果法官总是固守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绝对二分、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总是认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死板地寻找法条的规定,则无助于司法正义的实现,家庭反倒成为了施暴者合法施暴的庇护所和避风港,而婚姻也成了施暴者实施罪恶和逃避刑罚的温床,司法正义荡然无存。

(七) 社会性别视角

社会性别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联合国框架下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分析超越了以往仅仅关注妇女为一个孤立群体的做法,强调审视政策、法律和项目对男女产生的不同影响和作用。女权主义法学引入社会性别分析透视普遍国际人权标准,提出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概念化国际人权规范与标准的必要性,以使其能够真正反映男女两性的经历、利益和需要,最终有利于保障两性平等和妇女平等享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联合国层面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致力于将妇女人权纳入人权活动的主流表明,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13]。我国政府自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谋求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1995 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我国政府更是致力于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进程,在考量因长期受虐致特定关系人死亡情形时,社会性别分析视角也应当成为法官考量的因素。

注释:

- 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0 年从加拿大留学归来的陈敏律师对“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国内司法实践中的介绍和倡导,具有重要意义。
- ② 法释[1998]8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法发[2009]13 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参考文献:

- [1] [美]波拉·F. 曼格姆,黄列. 受虐妇女综合症证据的重新概念化: 检控机关对有关暴力的专家证词的利用[J]. 环球法律评论, 2003, (2): 139.
- [2] [美]大卫·诺克斯,卡洛琳·沙赫特. 情爱关系中的选择——婚姻家庭社会学入门(第 9 版) [M]. 金梓,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23.
- [3] 薛宁兰. 社会性别与妇女权利[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52.
- [4] 陈敏. 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A]. 陈光中,江伟. 诉讼法论丛(第 9 卷) [C].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4. 138 - 147.
- [5] Bronwyn Barta. 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在澳大利亚司法实践中的运用[J]. 黄晓文,叶衍艳,译. 法学杂志,2005, (6): 106 - 107.
- [6] 刘巍. 从以暴抗暴谈“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我国的借鉴[A]. 荣维毅,黄列. 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 国际视角与实证研究[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7] 赵凌. 受虐杀夫挑战传统正当防卫[N]. 南方周末, 2003 - 07 - 03(A12).
- [8] 赵凌. 刘检霞杀夫被判 12 年 新理论告负争议再起[N]. 南方周末,2003 - 07 - 17(A6).
- [9] 高绍安. 集中大规模培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J]. 中国审判,2010, (5): 卷首语.
- [10] 任志中,汪敏. 被害人过错与死刑适用[J]. 法律适用,2009, (1): 48.
- [11] 杜月秋. 论裁判的正当性基础: 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互关系为视角[J]. 法律适用,2007, (3): 39 - 40.
- [12] 孙谦. 建立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探讨[J]. 中国法学,2010, (5): 78.
- [13] 黄列. 社会性别与国际人权法[J]. 环球法律评论, 2005, (1): 7 - 17.